
何處是鄉關？流轉的臺灣認同

——楊正昭醫師訪談紀錄

訪問：許雪姬*

記錄：劉芳瑜**

時間：2015年5月17、18日

地點：受訪者加拿大溫哥華自宅

楊正昭，臺南人，生於1932年，臺南一中、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小時候隨父母到滿洲生活，日本戰敗後從滿洲回臺，在臺渡過青少年時期。大學畢業後，與王愛真女士共結連理，畢業後一邊在臺大工作，一邊申請赴美進修。楊醫師赴美接受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旋又往加拿大深造且定居，在溫哥華地區從事婦產科工作三十四年，並與友人積極參與設置臺加文化協會、大溫哥華臺灣同鄉會，關注臺灣政治與認同問題。生有一子二女，分別為 Mark、Nancy 及 Grace。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曾任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第三屆理事長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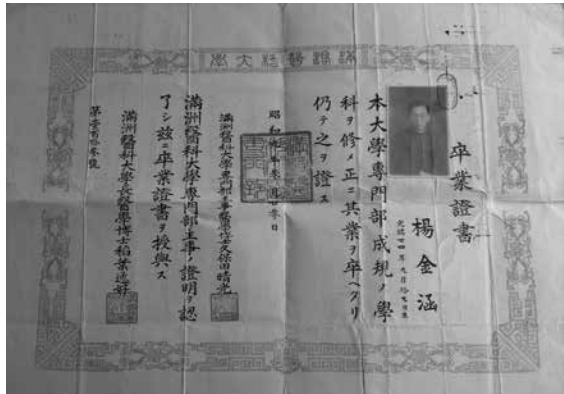


一、家世背景

我的爸爸是楊金涵，媽媽是林綢，我排行老大，底下還有二弟一妹。我曾聽爸爸提過祖父（楊老治）原本姓陳，是大灣地區的子弟，只是在出生後就送給蜈蚣潭（臺南龍潭）的楊家當養子，所以後來在分財產時因不是親生子的緣故，我們分得比較少的財產。爸爸生於 1908 年，學齡之後就到臺南府城求學，並於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畢業（戰後改為臺南第一中學）。中學畢業後爸爸到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原本主修法科，後來考量家裡的經濟環境和畢業的出路，才改到滿洲醫科大學（簡稱滿洲醫

大)專門部就學，並於昭和9年(1934)畢業，獲得畢業證書與開業的免許證。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是日本政府為非日本人(以中國人為主)訓練醫學人才的場所，學費相較帝大醫學部便宜，畢業後在滿洲求職機會也多，所以吸引許多人報考。加上爸爸本身在小時候曾讀過書塾，學習四書五經，雖沒有受過正式中國教育，但他會說相當流利的北京話，在大陸可能會有較好的發展。

於是父親在考取滿洲醫大後就帶著小弟一起到滿洲，希望能在滿洲開創新生活，不過叔叔(楊金城)只在滿洲待幾個月就回臺灣。父親在學時成績優良，在昭和6、7、8年(1931、1932、1933)連續三年獲得獎學金，在昭和9年獲得滿鐵總裁賞。爸爸大都待在滿洲，直到婚配時才特別回臺灣結婚。母親林網(1908年生)是臺南府城人，臺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畢業，¹娘家在臺南



1934年楊金涵醫師獲得滿洲醫科大學的畢業證書

1 臺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二戰結束後，該校與臺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合併改為臺灣省立臺南第一女子中學，1947年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南女子中學，1970年改為臺灣省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2000年配合精省，再度改為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南女中，《就是愛南女：國立臺南女中建校九十週年(原一高女90週年、原二高女86週年)校慶紀念特

民權路，經營布行，母親是家中么女，備受家人疼愛。

媽媽自臺南二女畢業後，有意從事教職工作，但因學歷關係不能直接到公學校教書，而到彰化師範科就讀一年後，才開始教書。父母親結婚後，媽媽沒有馬上辭掉工作到滿洲與父親一同生活，陸續在臺南媽祖廟公學校、明治公學校等校擔任教員，²幾年後才到滿洲一起生活。

二、在滿洲的生活

日本人到滿洲任職的薪水會比較高，父親自畢業後就在公務體系服務，昭和 10 年（1935）擔任奉天（今瀋陽）司法部看守所醫務科保健技師，昭和 14 年（1939）擔任奉天省衛生廳技佐。昭和 17 年（1942）父親被派到



楊金涵的醫師免許證（執照）

刊》（臺南：國立臺南女中，2008）頁 62。

2 林氏綱自 1926 年在臺南州媽祖廟公學校擔任訓導，1928 年至 1932 年改到臺南州明治公學校任訓導。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資料庫》，<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2015 年 9 月 11 日檢索）。

鐵嶺³擔任衛生課長，隨後在當地開業，時間約有兩、三年，有一段時間請了三個人幫忙，病人不少，他診治病人很小心，大多數為日本人，爸爸常需外出往診（house call），在他開業期間並沒有撰寫相關的醫學論文，主要是經濟上的壓力。

鐵嶺有滿鐵的醫院，各科齊全。有所謂 gown and town 微妙關係，如果是法定傳染病或須要住院的，他必須正確診斷後再正式照會去醫院。他回憶他少有誤診的情況，所以被大醫院的醫師們相當尊重，有些醫師是爸爸滿大的前輩。爸爸看診費用除了生活開支外，就存在當地的銀行沒有寄回臺灣。後來我和弟弟猜測父親決定自行開業的原因，我們認為與當時設立戒菸所父親與市長意見不和有關。雖然在滿洲生活辛苦，但不可諱言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黃金時代。

爸爸因為工作的關係，全家人搬到鐵嶺，鐵嶺是個小型都市，駐紮部分關東軍，當地公共建設只有一間日本人小學（約五、六百人）和滿鐵醫院，我不清楚當地是否有其他臺灣人家族。由於父親是公務人員，有來自政府的配給，最初家裡的配給數量少於日本人，我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母親為此向相關部門抗議，抗議後家裡的配給才與內地人相同。家裡的飲食習慣則臺日各半，仍以米飯為主，菜比較少。直到日本戰敗父親才結束在鐵嶺的工作，由於在當地沒有財產，父母很快就決定回臺灣。

在日本統治下，我們仍使用漢文名字，但大家都稱呼我まさあき或まさちゃん，後來在滿洲時全家人改了日本名字，以高山（たかやま）為姓，意指新高山（今玉山）的意思。爸爸重視姓名

3 鐵嶺，隸屬奉天省，位於奉天東北方。

學，改名字皆算筆畫，爸爸楊金涵改名為直也（なおや）媽媽林氏綢改名為周子（しゅうこ）。孩子的名字都是兩個字，筆畫分別是八畫和三畫，我叫作明久（あきひさ），大弟正義為忠久（ただひさ）妹妹榮華叫做和子（かずこ），小弟正幸叫幸久（ゆきひさ）。當時為了成為一位日本人，我只說日語，在滿洲從來沒有講過臺語。父母在家裡會使用臺語溝通，我能聽懂部分內容，但怕臺語說的不好，會被恥笑就不開口。回到臺灣我學講臺語，但到加拿大定居，臺語反而有更多的進步。不過在日本投降後，全家人就恢復原名，在我的印象中榮華和正幸是先有日本名字，戰後才取了中文名字。



楊金涵醫師全家福

後排坐者為楊金涵、林氏綢，前排右起為忠久（楊正義）、明久（楊正昭）、和子（楊榮華）

父母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總是要求我們好好念書，其他的事情都不用想也不用做。我在滿洲讀小學校，最初在新京（今

長春)的小學校就學，讀了一年，後來到奉天彌生小學校念書一年，之後就到鐵嶺小學校了，中學則在奉天第二中學。在學校老師都以日本名字稱呼我，身上穿著則以洋服為主，校服和家服多以立領(つめえり，詰襟)為主，少穿中國服(馬褂和對襟服)。在這段時間父母曾回臺灣，但我因學業緣故，沒有隨父母弟妹回臺，直到十四歲日本戰敗我才回到臺灣。

雖然我們待在鐵嶺，但在滿洲的臺灣人都會互相聯繫，從其他都市每次聚會各家都會把孩子一起帶來聚會，維持人際網絡。在我的印象中，我記得父母與黃順記⁴認識，黃順記在開原⁵



1945年鐵嶺小學校畢業典禮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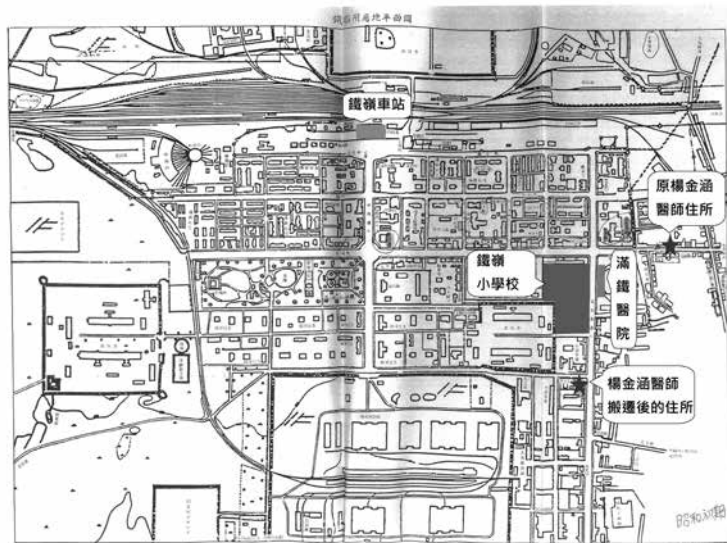
第一排左三為楊正昭，左六為若林校長，左七為村田老師；第四排左六為父親楊金涵，當時為鐵嶺小學校的校醫

4 黃順記，1905年2月19日生，彰化線西人。1933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後於奉天省開原開設博愛醫院。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鄭鳳凰、王美雪、蔡說麗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104。

5 開原，隸屬奉天省，位於該省東北部。

開業，他到滿洲發展是因為王大樹⁶的緣故。而父親與王洛⁷也是好朋友，王洛與日本人的關係也很好，他人非常好相處，總是面

- 6 王大樹(1905-1973)，臺南歸仁人，字希馮，父親王長勝為傳教師，曾在埔里大滿長老教會、新化新和長老教會等地傳教。成年後與陳章哲女兒陳瓊珠結為夫婦，生有一子五女。王氏自臺南長榮中學畢業後至滿洲就讀醫科大學本科畢業，1932年畢業後先在大連醫院擔任內科醫師，1934年任職安東市警察廳衛生課長，1936年任職撫順天生醫院，1937年至1945年在錦州地區開設錦生醫院，頗具規模，曾任錦州醫師會會長。戰後回臺繼續行醫，1947年在臺南南門開設錦生醫院。妻陳瓊珠生於1914年，卒於1996年，彰化北斗人，1914年隨父陳章哲至日本京都居住2年，1916年赴滿洲大連，1928年大連官立神明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參見許雪姬、黃子寧、林丁國訪問，藍瑩如、林丁國、黃子寧、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101-102；以及王愛惠女士提供資料。王愛惠女士回顧父親王大樹的一生，心中有無限感慨與懷念。她認為父親仁厚聰慧，勤奮向學，深得長輩疼愛和提拔，得以負笈前往滿洲醫科大學就讀。日後在錦州開設錦生醫院懸壺濟世，以其仁心仁術的醫生立場，博得當時滿洲當權者的尊重和錦州市百姓的愛戴和認同。以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生態，父親堅持王氏家族單脈相傳的血統，不願改姓成為當時的皇民，而以人道和基督信仰的情操、平等、熱愛，在動亂時代行醫救人。其中值得一提就是在政權交替動亂之時，父親以其在錦州服務累積的人脈，照顧當時在滿洲受難的臺灣人，提供生活起居的方便，幫助他們登上由善後救濟總署協助的救濟船返回臺灣，那種隨時有生命恐懼和焦慮，父親的援手是當時的一線希望。父親返臺後定居臺南繼續行醫，延續錦生醫院的生命，同時定期到臺南新樓醫院義診。父親對其一生充滿起落的歲月並無任何怨悔和對人性的疏離，那種謙和、誠懇、奉獻生命的特質深印我心深處，這就是我的父親，我們子女以他為榮、以他為傲。
- 7 王洛，原名王世恭，臺北市人，1931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1937年取得醫師資格，曾在滿洲國民生部衛生司工作。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鄭鳳凰、王美雪、蔡說麗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42。



鐵嶺地區平面圖

帶微笑，從來沒有開業，是一位研究型的學者，我主要從他的研究內容判斷，我感覺他做研究不是爲了出名，而是爲了人類的健康。在娛樂方面，在滿洲父母沒有帶我們旅遊，可能與經濟能力有關。母親會帶我們兩兄弟去映畫館（電影院）看日本電影，我對小時候的印象，記得母親常常帶著我們唱日本童謠，例如「ふるさとの四季」、「四葉草」、「証城寺の狸囃子」等等，現在我還會哼唱。

一般人總認爲近代以來東方人第一次打贏西方國家是在日俄戰爭的時候，但我認爲第一次打贏西方人是鄭成功擊退荷蘭人。有次我到旅順，參觀 203（爾靈山）高地，在日俄戰爭中乃木希

典⁸採取的戰術可說是人海戰術，在對戰過程中死了很多人，後來乃木回想這次的戰役覺得心中有愧，在明治天皇過世的時候，他也切腹殉道。乃木的長子和次子也死在這次的戰事上。而他到臺灣擔任總督的時候，也把他的媽媽帶到臺灣，他有心待在臺灣治理。日本人軍歌的特色是高低音落差很大，若是一直取得戰爭勝利，日本軍歌的曲調就很雄壯威武，若輸的話，曲調就顯得特別悲壯。

在鐵嶺完成小學教育，畢業後因鐵嶺沒有中學，我只得到奉天第二中學就讀，借住在老師家，現在我已經忘記初中一年級有沒有上課，只記得校舍的樣子。另外，我對新京仍保有深刻的印象，我記得當地天氣非常寒冷，家裡必須使用 Central heating(熱爐)取暖。而新京城市規劃頗具規模，當時新京是一座現代規劃的城市，聽說有一條主要道路，寬達 100 公尺。這是因為當時日本派了很多人到外國學習新技術，學成回國後便將技術先用在臺灣，第二就用在滿洲，新京的城市設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成的。

戰時奉天並未遭受空襲，所以戰爭的氣氛較其他地方和緩，

8 乃木希典(1849-1912, のぎ まれすけ), 日本山口縣人。1895年4月補第二師團長, 9月起率軍入臺南, 任南部臺灣守備司令官至翌年4月。1896年10月出任第三任臺灣總督, 在治安對策上採行「三段警備」制, 卻徒勞而少功; 又極力主張振肅官紀, 結果引燃行政與司法部門之衝突並導致引起憲法爭論的「高野孟矩事件」。1898年2月離職, 轉任近衛師團長。日俄戰爭時為第三軍司令官, 於戰爭中失去二子。1907年任學習院院長, 以精神主義教育皇族。1912年明治天皇出殯之日, 夫妻同時於自宅自盡, 被譽為「軍神乃木」。參見鍾淑敏撰, 〈乃木希典〉, 許雪姬總策劃, 《臺灣歷史辭典》(臺北: 文建會、中研院近史所、遠流出版事業, 2005), 頁46。

我從不覺得日本會戰敗，爸爸也是同樣的想法，當聽到日本投降，我受到很大的衝擊，價值觀在一夕之間大轉變。在戰爭後期日本的資源越來越貧乏，若有人說日本會輸，就會被說叛國、非國民。

當時蘇聯開始攻擊日本關東軍，火車客車已經停駛。我因為念書的關係待在奉天，父母擔心我會出事，就拜託任職於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朋友，他派一名機關手從鐵嶺開著火車頭到奉天接我，當時父母先用電話聯繫我，再派表哥（舅舅的兒子）隨著這位機關手一同到奉天找我。這位表哥跟著我爸媽住在鐵嶺，年紀約二十歲，在父親的醫院擔任助手。與他們碰面後，我坐在車頭放煤的地方，回到鐵嶺臉都是黑的，路程大概四十分鐘。

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軍隊到處抓年輕的男子去當兵，表哥不願去當兵，當國民黨派人來家裡找他時，他就躲在日式房子中天棚放置棉被的壁櫥裡（押入れ）。⁹之後表哥前往奉天避難，大概躲了一個月，之後才與我們會合，一同返回臺灣。除此之外，日本投降後許多日本難民步行到鐵嶺的難民區，正值八月底天氣炎熱，除了受傷的人，很多人罹患傳染病。爸爸每天早上巡回這些難民區，醫療藥品及醫療人員非常匱乏，他能做的事情，事實上非常有限。

尚未回臺灣前，我和弟弟曾在滿洲的中國人中學就讀一、兩個月，稍微能夠理解中文的上課內容，最難的是作文。而弟弟被其他同學指為漢奸，有些學生不但罵你還寫給你看，有些人也會勸說不要這麼做。戰後住在日本社區相當危險，日本人是被暴民

9 押入れ，指日式房間中設計製作的放被褥等物品的場所。

搶劫的對象，有滿洲人讓我們住在他鄉下的家，暫時避難。對他來說是件危險的事，需要有勇氣，因為在戰亂時無法預料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我對蘇聯軍隊印象甚差，日蘇曾簽訂互不侵犯條約，¹⁰ 卻在戰爭末期毀約。當時家裡也被蘇聯軍搶劫，當時我已經從奉天回到鐵嶺家裡，一個蘇聯軍官和一個士兵來敲門，父親去開門，他們就帶著槍進入屋內。全部人很害怕都站在一起，他們用槍指著我們，跟我們要了手錶，後來看到隔壁是醫療室就匆匆離開，行徑就像是土匪。我實在很難與擁有一流文學、舞蹈、建築的文化蘇聯作連結，或許當時來到滿洲的蘇聯軍是素質很差的人，或許因為蘇聯廣大遼闊，不能一概而論。但因我們曾直接在蘇聯軍的槍口下逃生，親眼目睹蘇聯的暴力、強姦等事情，很難對蘇聯有好感。

由於父親對待滿洲人從不帶有輕視的色彩，與當地人的關係良好，他們也信任我的父親。由於這個緣故，在這段期間裡有些日本人遇到問題，都會來找父親幫忙，請他與當地人溝通。例如我小學的校長若林雄次郎，他年紀比較大，有位年約 20 歲的女兒，收到一份徵調單，國民黨要調她到工廠做事，但他們怕被

10 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於 1941 年 4 月 13 日由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與蘇聯莫洛托夫為代表所簽的合約，內容共四條，重點如下：締約雙方聲明維持和平與友好關係，相互尊重締約另一方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若締約一方遭受來自一個或幾個第三國的攻擊時，締約另一方必須在整個衝突時間內保持中立。而條約自締約雙方批准之日生效後有 5 年效期，締約一方在條約有效期屆滿前一年未聲明廢止，則本條約應視為自動延長 5 年。此約在 1945 年 4 月 5 日蘇聯單方面宣布不再續約，廢止此合約，蘇聯更在同年 8 月出兵滿洲，攻擊日本關東軍。參見李嘉谷，〈論《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實際影響〉，《抗日戰爭研究》，1998 年第 1 期（1998 年 2 月），頁 54-73。

強迫去做慰安婦一類的事情，校長就到家裡找我父親商量，甚至想讓女兒服毒自殺。後來父親寫了一張診斷書，說她有心臟瓣膜症，這個診斷證明被國民黨接受了。住在我家隔壁的後藤夫婦，後藤先生是滿洲人中學的校長，後藤太太是鐵嶺在滿小學校（弟妹就讀的學校）的老師，有人密告他們家裡有槍枝，很擔心被抓去坐牢，在時局紛亂的情況下，生死難以預料，便向父親求救。後來由父親擔任保證人，他們才脫險。

三、戰後返臺與插班入學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我們從滿洲回到臺灣主要是透過善後救濟總署¹¹的協助，在東北的臺灣人到奉天集合，父親為團

11 1943年起，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鑑於大戰即將結束，便開始籌畫戰後的善後救濟事宜。聯合國善後救濟事宜是根據兩個原則：（1）由在戰爭中未被敵軍占領的國家，援助曾被敵軍占領破壞的國家。（2）接受援助的國家限於本身無力復興，又沒有別的援助的國家。根據這兩個原則，中國由於受害最深，又無力自立復興，所以是接受聯合國善後救濟最主要的國家。1944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成立（此處所指的聯合國，並非後來在舊金山制訂憲章會議所產生的聯合國組織，而是指當時對軸心國家作戰的各同盟國），第一任署長為李門（Herbert H. Lehman）。為了執行聯總在中國的工作，中國政府在行政院下特設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第一任署長為蔣廷黻。聯總以物資為救濟品，卻未必適合中國人的需要，例如輸華物資中有不少為牛奶，許多中國人不習慣喝牛奶，便拿到街上出售，此事被外國記者發現，以為聯總人員涉嫌貪污，國際輿論對聯總相當不諒解。其後又爆發「血清事件」，加上共產黨占領區救濟問題，使得善後救濟工作困難重重。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於1947年宣布結束。參見林怡君撰，〈行政院

長，共有五、六十人，我們先搭乘火車到天津，途中經過山海關長城，父親告訴家人可多看幾眼，因為以後可能再也看不到，到天津塘沽後無法馬上搭船到上海，約等了一、兩個禮拜，才有一艘 500 噸的小船載我們到上海，上海主要由臺灣重建協會上海支會理事長楊肇嘉負責，再從上海搭船到基隆，於 10 月回到臺灣。在這三個月中，善後救濟總署只負責提供免費的交通工具，期間的飲食都須自行準備。由於提供的船是貨船，船艙環境差又熱，船艙有種難聞的異味，許多人都暈船，我也不例外。離開滿洲國之後，我與日本同學都沒有連絡；小我兩歲的弟弟因為往後住在日本的緣故，與孩提時候的同學還有聯繫，舉辦同窗會。

而父親從滿洲回臺灣，就是一種逃難回國的經驗，父親在求職上完全沒有人脈，對父親而言，故鄉（ふるさと）就像朵玫瑰花，遠看很美麗，靠近就容易被刺傷，不如他想像中溫暖。由於生計，父親回臺後曾短期到高雄左營海軍醫院擔任副院長，這份工作不須每天到院上班，但特別的是必須加入國民黨，才能保有這份工作，他心裡對國民黨也有許多不滿。父親一邊工作，一邊就開業進行準備，最初在永康開設仁德醫院，上門治療的病患不多，之後改到大灣明德診所開業，家裡的經濟才轉好，最後搬到臺北仁愛路開業，並將院名改為楊內兒科，與掬水軒食品公司比鄰而居，而母親在家相夫教子，沒有繼續教書。

一回到臺灣，我對臺灣的印象就是天氣炎熱。另一個感覺就是落後，我親眼看到家族中還有女性纏足，覺得不清潔、文明差。就我而言，我沒有回家的感覺，因為是完全陌生的地方，加

上我不會說臺語，很多人覺得我是臺灣人又不會說臺語實在古怪。回臺灣後，我們與其他親戚關係生疏，重男輕女的觀念濃厚，我很少看到、聽到叔叔、姑姑的消息（包含父親，共六男三女），後來也不知道他們過世的原因。

回臺後父親就急著安排我和弟弟插班進入臺南一中初中部就讀，臺南一中是爸爸的母校，當時學校的訓導主任是爸爸以前的同班同學王耀東，因為王主任禿頭，所以學生幫他取了 500 燭光的綽號。在滿洲我已經會簡單的中文，所以插班就學時未遇到很大的困難，也順利考上臺南一中初中部三年級，弟弟則進入初中部一年級就讀。我不清楚能直接就讀三年級的原因，但我印象中日本的學制，每年四月後出生到隔年三月前出生的學童是同一屆就學的學生；而中國的學制與日本不同，中國是九月入學，戰後臺灣學制必須更改和中國相同，回臺後我參加插班考試，依據考試成績，學校方面認為我可以就讀初中三年級，剛開始上學的時候在適應上也有一些問題。在初中時期，我的歷史老師是王育德，¹² 他都用臺語上課，以說故事的方式上歷史課，讓人很容

12 王育德(1924-1985)，臺南人。1940年畢業於臺南第一中學校，1943年畢業於臺北高等學校文科甲類，同年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哲文學科，隔年因戰爭疏開返臺。戰後，任臺南第一中學教員。1947年其兄王育霖於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因感國府的壓迫，於1949年經香港亡命日本，翌年入學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科。1960年「臺灣青年社」成立，任委員長一職，並擔任臺獨刊物《臺灣青年》的發行人，主張臺灣民族論，認為臺灣的未來理想國，應由臺灣人自己建立，而臺灣人的定義，是認同這塊土地，而不分本省或外省。1969年以臺語系統的研究獲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1975年任「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長，1982年任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委員。1985年9月9日因心肌梗塞去世。他不僅是享譽國際的臺語語言學家，也是臺灣獨立運動

易就能吸收內容，雖然我並不能完全聽懂，但臺語的腔調很吸引我。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在學期中王老師就沒來上課，我們就聽到消息，國民黨要對付他了。其他老師多為外省人，他們鄉音很重，有時根本聽不懂授課內容。

當時我家在臺南的鄉下，距離永康火車站約 20 分鐘的腳程，但當時是泥土路，只要下雨天就變得很泥濘，只好赤腳走路，到了車站才把鞋子穿上。我對臺南市的印象，只記得赤崁樓，還有店面都有騎樓，這是臺灣建築的特色。雖然環境並不是很乾淨，還有さかりば（盛場、繁華街、熱鬧場所，當時是各種攤販聚集地），印象不錯。因為我通勤上學，放學就直接回家，很少在臺南市逗留，所以對臺南市印象不深。

那時臺灣社會很不平靜，前幾年我從淡水中學的校刊中，看到那時候校內有簡易的武器，但沒有槍這類具有暴力性的武器，不過陳能通校長考量在日本時代學生在學校都受過軍事訓練，擔心會出事，就請前來接收占領的國民黨軍官處理，沒想到不久之後發生二二八事件，就有人密告學校有武器，準備武裝叛亂，並說教務主任是領導者，後來陳能通校長、黃阿統、盧園老師都被槍斃。¹³ 這讓我不禁感嘆，中國人在二戰中贏得勝利，臺灣人回歸所謂的祖國，卻沒想到心目中的祖國把他槍斃了，落得這樣的下場。

的先驅和精神領袖。主要著作有《臺灣語音の歴史的研究》、《臺灣人原日本兵の訴訟》等，另有《王育德全集》（共 15 冊）行世。參見許雪姬總策劃，王美雪撰，〈王育德〉，《臺灣歷史辭典》，頁 208。

13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校校友會編，《淡江中學通訊：228 事件紀念特刊》，57 期（2007 年 3 月），頁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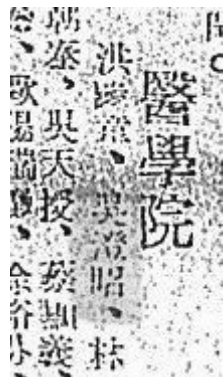
四、考取臺大醫學系

初中畢業後，順利考取南一中高中部。民國 39 年（1950）我參與臺灣大學考試。以當時的學制，必須先決定自己要報考的學校，那時我對於成爲一個醫生沒有太多的企圖，只是爸爸和他的朋友都是醫生，就以醫學系爲目標。那年臺灣大學招生考試中數學科難度很高，本來我對自己的數學有相當的把握，沒想到只考了三十三分，三分之二的考生數學零分。

臺大放榜我騎車到臺南市看榜單卻看不到我的名字，爸爸在大灣診所看清早遞送過來的《中華日報》，也找不到我的名字。後來我再去別的報館，才發現榜單將同班同學「吳澄銘」¹⁴和我的名字「楊正昭」印成「吳澄昭」。¹⁵

吳澄銘進入醫學系後選擇內科，並在臺南執業，我和他的命運猶如連體嬰，很巧合地他也罹患漸凍人去世。他患病期間，我曾與他用電話聯繫，他認爲無藥可醫，不願接受診療，但我覺得無論如何對這種病仍須進行診療。

到臺大念書，是我第一次到臺北，當時對臺北的印象就是個大城市，生活很熱鬧，印象很好，新生南路還存有大排（瑤公



1950 年 8 月 30 日《中華日報》所刊榜單，綠底處爲名字誤植處

14 吳澄銘，臺南人，2013 年 12 月 4 日過世。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在臺南忠義路開設吳澄銘診所，與受訪者楊正昭醫師是同窗好友。

15 〈臺大新生放榜錄取 866 名〉，《中華日報》，1950 年 8 月 30 日。



1953年冬楊金涵醫師全家福

前排右起為妹妹榮華（高二）、母親（林氏綢）、父親（楊金涵）、小弟正幸（初二），後排右起為大弟正義（大一）、受訪者正昭（大三）

圳)。我就讀臺大醫學系一年級時，臺大的校長是傅斯年，後來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接受郭國基質詢時發生腦溢血，當時許多臺大學生要去包圍郭國基，¹⁶但我沒有參加這個活動，後來由錢思亮繼任校長。前兩年我都在校本部上課，住在第八宿舍，宿舍早飯是粥，米粒很少都是水，配菜是花生。想吃比較好的飯菜就需到外面的小吃店吃飯。系上對成績好的同學會發給工讀金，大概是 50 元。我對於班上同學的感覺，覺得很多同學為人傲慢，

16 〈傅斯年先生昨猝然病逝 列席省參會時突患腦溢血 多方救治無效竟溘然長逝 各方聞耗同深悲悼〉，《中央日報》，1950年12月21日，1版。〈郭國基返抵高雄 今日遙祭傅斯年〉，《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4版。聯合報針對1950年傅斯年逝世的過程與後續發展曾撰寫專文，可參見〈議壇現形記 校長猝死 學生串連〉，《聯合報》，1993年3月4日，17版。

很想轉系，我寫信告訴父母我想轉系的想法，父母很不高興，要我回臺南商量討論。我記得那天我坐慢車回家，下著大雨。父母告訴我就讀醫學系的好處，結果我被父母說服了，決定不轉系了。事實上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轉到哪一個科系，只是隨口說要轉到化工系。所以至今我仍然很感謝我的父母，因為醫療是最適合我個性的職業，當時的我實在太不成熟，事實上在我的同學中也有不少謙卑服務大眾的人，我對於我講的話感到很不好意思。在醫學系的同學中，歐陽餘慶¹⁷的兒子歐陽瑞徵（現居加州）與我是醫學系同學，若是說更早的關係，瑞徵和我後來才知道在不同時期，就讀過新京的順天小學校。在臺大畢業後，還曾經同時在 Detroit Receiving Hospital 擔任住院醫師，他是神經內科。他的妹妹美麗是我太太愛真的臺大同學。

五、出國進修與執業生活

醫學院畢業後，我因為近視太深未達當兵標準而免役，也與

17 歐陽餘慶，又名歐陽慶一，1905年生，臺北淡水人。1924年臺北師範學校本科畢業，1931年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畢業，考進滿洲國大同學院，並於1933年第二期畢業。歷任國務院法制處雇員、同處屬官，總務廳屬官、同事務官等職，1938年4月任總務廳法制處參事官兼大同學院教官。長男歐陽應瑞、次男歐陽瑞徵、長女歐陽氏吻、次女歐陽美麗。參見許雪姬、黃子寧、林丁國訪問，藍瑩如、林丁國、黃子寧、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282。許雪姬，〈「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12年9月），頁135。

妻子愛真結婚。當時在沒有人脈、背景的狀況下，只能一面在臺大工作，一面準備出國。民國 48 年（1959）我以學術交流名義（學者）到美國留學，美國方面提供住宿和飲食的補助，當時在適應上遇到很多困難，大概在美國生活一年之後，我才知道美國有中國城（China Town），在這一年之中都沒有吃到中國的食物。一直到民國 76 年（1987）臺灣解除戒嚴，我才重新踏上臺灣的土地。在這之間因為被政府列為黑名單，兩次申請回臺都被拒絕，之後就不申請回臺了。¹⁸

在美國期間，我聽聞加拿大對於移民更加開放和自由，民國 53 年（1964）我與妻子愛真再到加拿大，民國 55 年（1966）正式在加拿大開業，展開移民後的生活。媽媽與爸爸分別在民國 56 年（1967）和 58 年（1969）到加拿大，我認為他們辛苦一輩子，可以休息享受人生了。父母移民來加拿大，年紀將近六十歲而已，但是加拿大是歐美國家，適應文化生活環境並不容易，當時和他們同輩的同鄉很少。同鄉會成立後，聚會、聚餐是他們最喜歡的活動。當時有一個形容他們的說法，他們是 blind, deaf and lame，因為英文看不懂，英語聽不懂，又沒有車子。當時爸爸自學彈吉他，彈奏幾首臺灣歌曲，或是中國的音樂，但大部分是日本歌，他特別喜歡古賀政男的曲子。此外他也很用功借了很

18 受訪者不知道被禁止入臺的實際原因，但猜想應該與兩件事情有關，第一，溫哥華臺灣同鄉會成立於受訪者自宅，當時這種舉動被認為是叛國行爲。第二，在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期，因當時加拿大沒有臺灣政府代表處，受訪者常到西雅圖參加示威活動，示威者都帶面具，怕在臺灣的家人、朋友受到牽連，受訪者接受當地報紙電視媒體訪問而拿下面具，且告訴媒體名字。

多書閱讀，大多數是日文書籍，內容包含各方面，也有不少是關於移民歷史。他閱讀這些書籍的結論是，我們在此地，不要忘記我們是亞洲人、黃種人。爸媽也在本地長老教會禮拜，但他們聽不懂英文講道，所以我只好帶他們去日本人教會，父母很高興。日本人也相當尊重他們，有時也請家父做專題演講。後來溫哥華成立了臺語教會，父母就轉到那邊做禮拜。最後爸媽都在加拿大過世。現在移民的人很多，適應上不如以前困難，舉個簡單的例子，以前要吃豆腐還要自己親手做，現在在超市就可買到。

1983年愛真提出購買墓地的想法，我同意後將這件事情告訴父母。我們準備在加拿大尋找墓地，並購買父母的部分，死後家人都能葬在同一個地方。原本我以為父母聽到後會很生氣，會說我還沒死就幫我找墓地，沒想到母親不但不生氣，反而開玩笑墓地不能找埋葬許多廣東人的區域，因為她怕吵，從此我也感受到母親的幽默感。我們去看了一處墓地，當地負責人介紹一處中國人比較喜歡的墓地，那裡安葬了許多中國人，但並不是特別隔離讓中國人安葬的地方，當天我們決定在這個墓園買了墓位，父母分別於1995、1998年過世，就安葬於加拿大。這件事情讓我覺得有意義的是在於他們已經沒有回鄉埋骨的觀念和思維。

我感謝上帝讓我從事醫師這份工作，從美國到加拿大我先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簡稱UBC）進修時，UBC的教授希望我能留在學校作研究，但我認為我不夠聰明，沒有創建（creative）的特質，我只是非常努力，所以我選擇臨床醫學這條路。我在加拿大自行開業，我們在診所（Private medical office）替病人看診後，住院、產房、開刀、護理及治療等等全都只能在設備完善的醫院處理，醫院只能接受這

類醫師介紹住院病患，所有的病人也是透過我們才可以住院。我直到民國 88 年（1999）正式退休，結束長達 34 年的婦產科醫師生涯。

退休之後，同年溫哥華兒童醫院慈善組織請我協助他們，幫忙募款擴增兒童醫療器材。我從來沒有做過募款的工作，只做過協助臺灣醫師、牙醫師移民到加拿大以及開業問題。這個慈善組織曾找中國人、香港人幫忙，現在找了臺灣人，當時我也不知道自己哪來的膽子，就答應替他們募款，這或許與我的接生經驗有關。我在溫哥華 Richmond 地區替人接生時，剖腹產過程正常，但嬰兒卻在出生後幾個小時內發生呼吸困難的狀況，這時小兒科醫師將嬰兒轉診到英屬哥倫比亞兒童醫院（British Columbia Children's Hospital，簡稱 BCCH），第二天我打電話到兒童醫院（BCCH），發現夜間又轉送到 Alberta（亞伯達省）位於 Edmonton（艾德蒙頓市）的 Royal Alexandra Hospital，因為 BCCH 當時還沒有葉克膜（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簡稱 ECMO）設備。將嬰兒轉送到那麼遠的地方，須租專機（Air Ambulance），也要醫護人員小組在空中照顧嬰兒。

美國與加拿大二十幾間兒童醫院聯合組成聯盟，大部分的兒童醫院都在美國；加拿大只有兩間，一間是多倫多兒童醫院，另一間是英屬哥倫比亞兒童醫院，在轉診的過程中須有醫生和護理人員陪同，轉診必須負擔很高的費用。雖然這樣的案例每年約有 10 例，並不多見，但若有葉克膜，就可以節省這些轉診時間和費用，而且器材也可以重複使用，所以英屬哥倫比亞兒童醫院希望能募款二十五萬元加幣，作為購買葉克膜的費用。因為這次

的接生經驗，我心想若母親還在住院，孩子卻要被送到另一間醫院，母親的心情必定很難受，因為不能跟著孩子到另一間醫院，所以就接受了這個挑戰，後來回想當時我真的是「戇膽」(gōng-tǎnn)，覺得並非需要勸募好幾百萬加幣，只需募二十五萬元的買機器費用。通常募款者背後都有個大企業或銀行支持，我主要是靠小額募款和賣票所得，也曾向杏林醫聯會(Taiwanese Canadian Health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募款。¹⁹

後來我問了醫院基金會負責募款的人，如果募不到款怎麼辦？他告訴我明年繼續募款。雖然當時我是杏林醫聯會的會長，但醫聯會的成員大多數不在此地，十二個理事中只有兩、三人可以出席理事會，令我感覺很孤單。募款過程真的很辛苦，到處「碰壁」，甚至有時感到孤軍奮戰，但也見到了不少熱情大方慷慨人士，讓我感動，最後募到了加幣三十萬，鬆了一口氣。不少臺灣同鄉跟我說 proud to be Taiwanese-Canadian。甚至本地有一中文報紙專欄說這是奇蹟，這是有點太過獎、「膨風」(phòng-hong)了，只不過是我在此地社會社區做了一點貢獻。七、八年後，兒童醫院邀請了所有用過葉克膜而活下來的小孩和他們的父母，辦了BBQ聚會，也邀請我參加，給他們介紹那個機器是怎麼來的。當那些兒童跟父母親走來向我道謝，我覺得光榮感謝，也是上帝的賜福。

19 杏林醫聯會(Taiwanese Canadian Health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當時臺灣有很多醫師、牙醫師及護理人員移民到加拿大，尤其是溫哥華，所以成立了帶有友誼性質的杏林醫聯會，同時也希望能夠為當地醫療狀況進行貢獻，如將英文手冊翻譯成中文，以供中文語言的新移民使用。在募款那一年，我被選為會長。

此外，在我長期擔任婦產科醫師的過程中，我也看到生男生女問題。我自己的親身狀況是妻子愛真在生第一個小孩的時候，我的岳母特別專程從臺南到臺北臺大醫院陪產，因為她怕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後來第一胎生了男孩，岳母覺得沒有壓力，後來生第二個小孩就不到臺北了。她會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岳父母到第四個小孩才有男孩。另外就是我曾幫一位印度婦女接生第二胎，她與丈夫已經有了一個女兒，當時西方社會十分流行丈夫陪同太太進入產房了解生產過程，這次又生了一個女兒，這個丈夫竟然當場哭了起來。我心想他的太太經過非常痛苦的過程才生下孩子，丈夫卻失望不是男孩，還在太太面前哭，我實在非常不能認同這種想法。

這些事情讓我清楚看到人對女性的歧視，婦女懷的孩子若是女孩，醫生常常被要求拿掉小孩。我認為這是不可以的事情，在未來的社會一定會發生問題，生男生女上帝自有安排，生男生女的比例並非是 1 比 1，而是比較接近 1.05 比 1，這是因為男孩的淘汰率高於女孩的緣故。墮胎的狀況是還沒生產就先淘汰。

六、臺加文化協會與臺灣同鄉會

(一) 臺加文化協會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Society)

民國 79 年 (1990) 林宗義²⁰ 先生邀請友人到家裡聚會，聚

20 林宗義 (1920-2010)，臺南人。父親林茂生是著名的哲學博士。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醫學士、日本東京大學醫學博士，曾至倫敦大學、哈佛大學進修研究，其專長為精神醫學。曾任東京帝大副手及助手、臺灣

會中討論如何加強臺灣和加拿大之間的聯繫，便開始籌備協會活動，民國 80 年（1991）3 月在溫哥華東寧書院，²¹ 正式成立臺加文化協會，並推選林宗義教授為首任會長。²² 林宗義教授之前是密西根大學精神科教授，他在學校之外擔任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簡稱 WFMH，民間組織）²³ 主席，有一年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簡稱 UBC）召開全國總會，請美國總統夫人羅莎琳·卡特（Eleanor Rosalynn Smith Carter，1927- 至今）到場演講，林宗義先生後來獲得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名譽主席（終身榮譽職）。

省立錫口療養院醫務主任醫師；臺灣大學醫學院及臺大醫院精神經科主任、教授；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研究所主任、美國密西根大學精神醫學及精神衛生學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加拿大溫哥華地區精神醫療及精神衛生部特別顧問、東京大學精神醫學及精神衛生教授、高雄醫學院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世界心理衛生協會榮譽主席等職。參見臺灣當代人物誌資料庫，<http://2011hj01.litphil.sinica.edu.tw:8035/cgi-bin2/Libo.cgi?>（2015 年 9 月 15 日檢索）。

- 21 全名溫哥華東寧書院（Vancouver Formosa Academy），是加拿大卑詩省教育廳立案的私立中學。該校位置原是溫哥華基督教學校。東寧書院創立於 1989 年，是國際學生欲進入加拿大高中留學之間的橋樑。該校幫助學生課業學習及生活文化適應，以便日後在北美能順利留學。參見東寧書院網站，<http://www.vfa.bc.ca/>（2015 年 9 月 22 日檢索）。
- 22 臺加文化協會，《臺加 20》（溫哥華：臺加文化協會，2011），頁 9。
- 23 世界心理衛生聯盟成立於 1948 年，其目的在於預防心理和情緒障礙，並能正確處理心理疾病，以促進心理健康。該聯盟透過其成員的聯繫，促進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藉此提高全世界的精神衛生服務和研究，其聯盟和個人成員包括各學科的精神工作者、心理健康服務等相關人士。參見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官方網站，<http://wfmh.com/>（2015 年 9 月 15 日檢索）。

之後臺加文化協會不斷舉行大量的文化活動，也舉辦過兩次臺灣環島旅行。早期我在臺灣沒有機會到各地旅行，只有參加學校的校外教學曾到過關子嶺，在這兩次的活動中，旅遊的地點都是由我們自己決定，而非旅行公司。透過這兩次旅遊，我重新認識臺灣。就我先前離開臺灣的印象，臺灣社會進步許多，像我坐捷運，不只一次都有人讓座給我，這種行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養成，不是被迫而是自動的。在日本坐電車通常很擁擠，許多年輕人看到老人就假睡不讓座，所以臺灣的狀況是難能可貴的。就我來說，我是以一個在外的觀點了解臺灣，釐清臺灣的問題和歷史，這大概因為人在外地就會特別重視自己的根（故鄉）吧。

臺加文化協會對於推動多元文化也不遺餘力，有一天 British Columbia（卑詩省，簡稱 B.C.）省政府撥款修建臺加文化協會的辦公室和活動中心後，慶祝開幕時，有兩組小朋友表演舞獅，原來是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等於是領事館），從臺灣請到專業舞獅老師，指導本地小學生表演舞獅。小朋友表演完畢拿掉面具，四個小朋友中竟然有三個白人，一個臺灣人。當時卑詩省多元文化廳長站在我身邊，她和我互看了一下，相當驚訝，其實這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真諦之一。後來卑詩省政府也任命我做省政府多元文化廳顧問，任期三年。去年（2014 年）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特別展出臺灣布袋戲，這個團隊的團長是位荷蘭人。荷蘭是第一個來臺的殖民者（colonizer），現在卻有一個荷蘭人到外國，代表臺灣介紹臺灣文化。

（二）大溫哥華臺灣同鄉會

在加拿大定居、留學的臺灣人，一直都互有聯繫，也會聚

會。民國 52 年（1963）加拿大多倫多以及附近城市成立臺灣同鄉會。在溫哥華的同鄉會是我和友人共同推動，民國 55 年（1966）正式成立大溫哥華臺灣同鄉會，至今年（2015）大溫哥華臺灣同鄉會成立 50 年了。現在要成立同鄉會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在那時候組織同鄉會等於叛亂行爲。那時剛好宋善青²⁴教授到溫哥華，我想幫他洗塵，就邀請他到家裡聚會，也邀請一些朋友一同同樂，其中大部分是 UBC 的學生。飯後我就表明應該組織一個同鄉會，大家沒有反對，就這樣成立了加拿大溫哥華的臺灣同鄉會，我曾擔任加拿大臺灣同鄉會西區副會長。

七、臺灣認同與政治問題

從滿洲回臺灣，我歷經國民黨嚴格的思想控制，對我自身的認同產生很大的問題。當時我才剛從小學畢業，進入初中念書，因年紀還小，尙未深入形成日本思想與認同。然而，與同樣受日

24 宋善青，1924 年出生於新竹竹東的醫生世家，父親宋燕貽是當地的首位醫生，並建立竹東地區最著名的長春醫院；兄長宋瑞樓也習醫，是知名的肝炎權威，有「臺灣的肝炎之父」之稱。宋善青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系，由於對生化研究有極高興趣，在 1951 年獲得了中美基金的獎學金，隨即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研究所深造。學成後回到臺灣大學任教，1959 年獲美國科學院的邀請，再度赴美研究；1961 年，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醫學院力邀至加拿大做酵素研究，故移民加拿大，並在當地醫學院擔任教職，1966 年轉任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並在此退休。參見客家委員會「海外客家人奮鬥故事」網站，http://www.randl.com.tw/hakka/pro.php?offset=0&main_id=2&mid_id=16&cate_id=44（2015 年 9 月 14 日檢索）。

本教育的李登輝相比就不同了，李先生約大我 9 歲，日本戰敗他已經是讀京都帝國大學的大學生，對日本的認識遠高於我。回到臺灣之後，我們被國民黨稱為非國民，被日本人奴化，但我認為臺灣人被日本人統治並非是臺灣的錯。

我本人對二二八事件並無深刻的印象，倒是家父從臺南市回來，也看到了湯德章²⁵的屍體，政府不准家屬前往收屍。對於白色恐怖我也沒有太多的感受，只有愛真妹妹的先生曾遭受白色恐怖，當時他只參與讀書會而已，就怕被告發，後來躲到山上一陣子，最後自己下山自首，才受到輕微的處分，但往後若要出國，就會有問題。

在求學期間，由於許多臺灣精英被殺害，父母親多次提醒我不可以參與政治事務。又因為國共內戰的緣故，社會上瀰漫著過分反共的氣氛，我認為國共內戰與臺灣人根本沒有關係。當時我感到思想控制非常厲害，我們不可以自己想，一定要聽三民主義、反攻大陸等等教條。政府卻用「反共」做壞事，迫害臺灣人與外省人。一直到出國留學後我才慢慢形成臺灣意識，也投入政治活動。

我開始關心臺灣政治，主要與兩件事情有關，第一件事情是 1970 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到美國訪問，被留學生黃文雄刺

25 湯德章，日本警察坂本與臺南湯姓女子之子。臺南師範輟學，再入臺北警察練習所就讀，畢業派至臺南當警察，曾任警察局司法主任，因辦案與上司頂撞，辭職，至日本唸東京私立大學，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回臺當律師。戰後任南區區長、臺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任委員，候補省參議員。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擔任處理委員會臺南分會治安組組長，出面安靖市面秩序，卻在事平後被處死。參見沈懷玉撰，〈湯德章〉，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頁 892。

殺未遂事件，第二件則與王育德創辦的《臺灣青年》有關。由於父母一直不停告誡我不能參與政治，所以我一直沒有投身政治活動，但這兩件事情觸發了我對臺灣政治的熱情。其實我在臺灣渡過青少年時期，但在成長過程對於臺灣文化很陌生，我連布袋戲都很少看過，因為我看不懂也聽不懂。我剛開始接觸《臺灣青年》覺得很感動，但有的人卻很怕收到這份刊物。我認為同樣的祖先，後代一定要繼續在一起嗎？因為歷史演變不同，後代也變得不一樣，已經沒有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了，是不同的系統了。王育德是我的中學歷史老師，1970年代他到加拿大推銷《臺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²⁶我雖然沒有直接與他見面，但召開同鄉會年會時我曾幫忙推銷。現在王育德的女兒王明理²⁷繼續在日本從事臺灣獨立的工作。我能夠沒有壓力參與政治活動，是因為我的家人都不在臺灣，不用擔心家人被政府迫害。不過有一次母親申請回臺簽證時，那時母親已經是加拿大公民，必須申報在臺灣時的住址，母親申報外甥的居住地址，這位外甥就是在滿洲和我們住在一起的表兄。聽說母親還未回到臺灣，表兄已經被當地警察請喝幾次咖啡，母親回臺灣期間反而沒來找她。

26 《臺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作者為王育德，王氏以臺灣人立場，以在地史觀概述臺灣歷史的發展脈絡，深入分析各時代的真實狀況與特色之處。作者希望藉由此書能讓臺灣人閱讀臺灣自己的歷史，一起為臺灣的未來設想。參見王育德著、黃國彥譯，《臺灣·苦悶的歷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11-15。

27 王明理，1954年出生於日本東京，為王育德次女。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院英文系，1979年與日本人結婚。現任臺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理事、在日臺灣婦女會理事、日本詩人俱樂部會員、詩刊《阿由多》、《月臺 Platform》成員。參見王明理，〈作者介紹〉，《故鄉的太陽花》（臺北：玉山社，2015）。

認同問題是我非常關心的議題，也是現在臺灣人最重要的問題。就像是吳濁流的小說，書中內容曾寫臺灣人想做日本人也做不起，想當中國人，中國是自己的祖國，卻也沒有辦法成為中國人，但這樣的問題並不是臺灣人的錯。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在1930年代日本已經完全控制臺灣，日本給人的感覺就是現代(modern)、文明的國家，日本的皇民化和現代化是綁在一起的。中國和日本同受到西方國家的入侵，但中國真正的覺醒比日本晚了三、四十年，雖然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文化卻比先進步。

有一個臺灣人名叫許昭榮，²⁸他讓我印象很深刻，他的年紀

28 許昭榮(1928-2008)，臺灣屏東人。1943年參加日本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二期，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時，以「整備兵長」復員；戰後，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清鄉」，被迫投入中國國民黨海軍「臺灣技術員兵」，遠赴山東青島參加「國共內戰」；1950年經歷塘沽、長山島等戰役，獲頒「海功」、「海光」獎章，當時因無「退役」制度，請長假回臺灣，進入中油高雄煉油廠工作，被密告「逃兵」而遭逮捕回軍復補；1955年奉派赴美接收「咸陽」號驅逐艦，回國後，因攜帶「臺灣獨立運動第十年—1955」小冊子，被依叛亂條例二條三，判處十年徒刑，移送綠島。1968年出獄後，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政治庇護」而留居多倫多，直到1992年國府解除「海外黑名單」才返回臺灣。回臺後，許昭榮有感於臺籍老兵被統治者差別待遇難以釋懷與沉默，乃於1994年成立「全國原國軍臺籍老兵暨遺族協會」的組織，以進行臺灣老兵戰後補償及建碑慰靈的訴求。許昭榮回臺灣後，以追討臺灣老兵的尊嚴與公道，和建置「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為終身職志，眼見這項終身職志之一的地標即將被毀，決定以死捍衛。最終選在2008年5月20日中國國民黨再次執政當天(馬英九就職第十二屆總統)，以自焚方式結束生命。張守真訪問、曾駿文紀錄，〈許昭榮先生專訪紀錄〉，《口述歷史：臺籍老兵話滄桑》(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4)，頁1-71。高雄市關懷老兵協會網站，<http://taiwan-soldier.blogspot.tw/> (2015年9月23日檢索)。

大我三、四歲，日本投降時他正值十七歲，是海軍工廠的工員，日本人把他派去南洋。戰後他被編入國民黨軍隊，被要求去打共產黨。那時約有 2 萬臺灣人爲日本人到南洋打仗，李登輝的兄長²⁹也在其中，甚至爲日本戰死，他的牌位還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內。近年來臺灣的某立法委員到靖國神社抗議，要求供奉的原住民牌位要帶回臺灣，其實他不了解祖先爲日本出征的心態。在這些臺灣人之中，許多替國民黨攻打共產黨的人卻被留在大陸，後來甚至被共產黨要求去打韓戰，一直無法回臺灣。部分回來的臺灣人，國民黨政府也不理會、照顧這些臺灣人，現在執政的馬英九政府都沒有爲臺灣人做事。臺灣人的心裡一直要成爲其他國籍的人，我認爲臺灣人必須要覺悟，不要想做別人，而是要做自己。臺灣人透過自己經歷的事情，由自己告訴自己是誰，而不是讓別人告訴你你是誰，這是一個自我認同的問題。

我在臺灣住了十三年，我很願意爲臺灣做事，因爲我的根在臺灣，我也認同臺灣；但移民到加拿大的臺灣人，應該也要認同加拿大，並貢獻於加拿大社會。因爲若在加拿大的臺灣人只關注臺灣，只爲臺灣做事，就不能批判 1949 年從中國遷移到臺灣的移民，只認同中國，把臺灣當成中途的保護站，利用臺灣的資源，準備反攻回大陸。這也像許多中東移民到加拿大，只把加拿大當成一個庇護的地方，對加拿大沒有認同感，中東局勢平穩就

29 李登輝的兄長爲李登欽（岩里武則，1921-1944），臺北三芝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臺籍日本兵的身分加入日本海軍陸戰隊，前往菲律賓參與太平洋戰爭，後來於 1945 年 2 月的馬尼拉戰役中戰死。參見上坂金子著，駱文森、楊明珠譯，《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臺北：光覺出版社，2001），頁 42-43。

回到中東地區，中東發生戰爭，幾萬人要求加拿大政府照顧公民，加拿大政府爲此另外撥款派船接這些移民回國。我認爲只要居住在這片土地上，就應該爲這片土地做事、做該做的事。若對這片土地沒有貢獻，其他人就不會有尊重你的心。如果在加拿大的臺灣人能爲加拿大這片土地做事，就能爲臺灣做更多又有效率的事情，天天只談論臺灣是沒有用的。³⁰

民國 68 年（1979）12 月 10 日臺灣發生美麗島事件，當下知道消息，我們在海外的臺灣人覺得臺灣不應該發生這種事，就號召四十餘人，租車到西雅圖的中華民國外交部辦事處抗議。當時大家心裡都很害怕，臉戴著面具，那時當地的電視臺來採訪我們，我們都沒有任何準備，大家也不敢說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只能挺身而出脫下面具接受採訪。當我回到溫哥華，家人說在電視上看到我。後來我又數次前往西雅圖抗議。

我更佩服在臺灣傳教的傳教士，他們的一生奉獻給臺灣，本來這些人準備到中國傳教，卻被中國政府趕出中國，就改到臺灣奉獻，像是基督教長老教會曾派傳教士在臺灣東部從事文教工作或是照顧原住民和病人，他們在臺灣奉獻一生，教會準備送他們幾個已很高齡的人回歐洲的家鄉，向他們的家人告別，因爲他們是準備在臺灣結束一生，並埋葬在臺灣。³¹ 這些人真是比我們更

30 此段參考 Julia Lin，〈楊正昭醫師：「臺灣移民，對本地加拿大國家社區要有貢獻」〉，《臺加月刊》，第 8 期（2015 年 9 月），頁 12-14。

31 可參考范毅舜，《海岸山脈的瑞士人》（臺北：積木文化出版社，2008）。臺北東門教會盧俊義牧師曾寫專文推薦。盧俊義，〈這是一本傳道者和神學生該讀的書《海岸山脈的瑞士人》〉，《臺北東門教會週報》，2008 年 9 月 21 日，牧師專欄。

愛臺灣，是更上一層的臺灣人，讓我們覺得慚愧。我認為臺灣人的定義是，真正把臺灣當做他 / 她的家的人，不管是本省人外省人或其他種族的人。

我記憶中臺灣人（朱木炎）在奧林匹克運動會拿到金牌，回國接受訪問，他要把金牌捐給母校（國立體育學院），因為他認為能獲得這樣的成就是靠母校栽培。³² 我看到這則新聞覺得很感動，因為金牌是給個人，而非國家或團體，像是在籃球比賽獲得金牌，每個球員都有一面金牌，而他獲得金牌卻能想到幫助他的母校。而李安雖是外省人的子弟，卻以臺灣人自居，這點也讓我佩服，代表他認同臺灣。³³ 關於臺灣認同的問題，我的表達可能不夠完整，所以借用李安在 2013 年江蕙的演唱會上寫一封信，他寫給「親愛的臺灣」，我認為這就是認同臺灣的表現。全文如下：

「臺灣怎麼個好法？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只覺得自己在這裡自然正常的生長，她的好，是一種理所當然，沒什麼特別，也沒有什麼不對。隨著年歲漸長，又長居在外，對臺灣的情感越來越抽象純淨，既是一種思念與回味，更是一種內斂，深切而稠密的依戀。臺灣什麼都有，卻什麼都不搶眼，自然，親切，誠如清粥小菜。

32 〈奧運金銀銅牌 國體全包了 朱木炎要捐金牌 校史館等著陳列〉，《聯合報》，2004 年 9 月 3 日，B2 版。

33 李安，1954 年出生於臺灣屏東，父親李昇 1949 年隨國民黨來臺，李安是外省第二代。李安在國際影展上獲獎時，總是不忘感謝臺灣，認為臺灣就是他的故鄉。參見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609000516-260112>（2015 年 9 月 23 日檢索）。張靚蓓，《十年一覺電影夢》（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2），頁 18-19。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歷史與地理因素，養出臺灣這麼多好人，真是 Nice！。雖然她有她的難處，但身為臺灣人我很珍惜。謝謝臺灣的養育與滋潤，我願意為臺灣付出！」³⁴

八、中國現況與兩岸問題

雖然臺灣人與中國人來自相同的祖先，但我認為現在不一定必須是同個國家，因為兩者的生活環境已經不一樣，沒有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其政治體制也不相同。民主國家通常比較富裕，而且互相之間也很少有打仗的情況產生，雖然民主國家也有一些問題，但與其他體制比較起來，是比較好的模式；中國現況是由國家所控制，經濟高度成長，但這樣的狀況能維持多久的時間？中國目前的暴力問題令人感到害怕，更何況還有其他許多問題。自由的可貴，只要人失去後就會明確感覺到其中的滋味，而明明知道中國是這樣的政體，還要向它靠攏嗎？

中國的「反分裂法」可說是一種恐怖主義，臺灣只要宣稱獨立，中國就會攻擊臺灣；中國還將它定成法令，若臺灣獨立，中國沒有武裝動作就違背法令，可被說是漢奸。不過臺灣的地位特殊，位於交通要道，雖然是個小地方，島內超過二百座高山又超過三千公尺，是個多山、動物和物產豐富的地方，雖然政治形勢

34 〈江蕙開唱驚喜 李安寫信給臺灣〉，2013年5月18日。中央通訊社網站，<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305180063-1.aspx>（2015年11月24日檢索）。

常讓人感到危機，變化又快，有時感覺毫無希望，卻又絕地逢生，我都認為這是上帝給的第二次機會和選擇。但現在我感到臺灣的國際定位非常可憐，連尼泊爾發生地震，尼泊爾政府還拒絕臺灣搜救隊的協助，只怕得罪中國。

面對歷史問題，我認為每個人都必須學習歷史，減少犯錯的機會，但現今所留下的歷史多是勝者的歷史，勝者的歷史就是正統的歷史。中國人的歷史觀念從不檢討自己的錯誤，只一味要求別人要反省、道歉。國共內戰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鬥爭，根本不關臺灣人的事情。而兩黨在內戰中的行為並無太大的差別，共產黨爲了讓國民黨軍投降，曾數月包圍一個五十萬人口的長春，不准任何人進出，³⁵ 城內沒有食物可吃，最後國民黨軍投降，這段期間餓死了三十三萬名百姓，只剩十七萬人存活。這比南京大屠殺還恐怖，是自己人殺害自己的同胞，雙方都用這種戰術包圍對方，中國人的死亡人數遠多於南京大屠殺。而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因飢餓死亡的中國人民，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去的人民還多。舉這些例子並非要否認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國人，而是要接受歷史事實。中國人殺害自己人的數量遠比外國人多，卻不能說，這種國家有將來嗎？靠攏中國的人真的有好下場嗎？結果都是否定的。

35 應指遼西會戰，又稱遼瀋戰役，發生在 1947 年 5 月至 1948 年 3 月在長春、錦州、遼西、瀋陽等地的戰役，是國共內戰中規模甚大的戰事。在此役中國國民黨因內部戰略和派系間問題，加上國、共、美、蘇在中國東北的角力而複雜化，國民黨軍也因此役失敗，徹底失去在東北的控制權。參見林桶法，〈蔣中正與遼瀋戰役〉，《蔣中正與民國軍事》（臺北：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頁 137-174。

我的孩子 Mark 大學畢業（1979）的時候，我本來想帶孩子回臺灣作為畢業禮物，但因我是政府列管的黑名單成員，以致於無法回臺，就想不如帶著孩子跟團到中國旅遊。到中國旅遊前先在日本住一段時間，我的孩子非常喜歡日本文化，之後到中國，旅遊的地區以我去過的東北地區（滿洲）為主，如瀋陽、長春、北京。後來小女兒在 1989 年畢業，當時準備帶女兒到中國旅遊，卻發現中國的情勢緊張，不適合前往旅遊，不久後中國就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隔年我主動詢問小女兒是否有意前往中國旅遊，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旅遊的費用不但便宜，治安也更安全。她告訴我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對最優秀且是未來國家希望的學生開槍，她不願意到這種國家旅遊。因為這個理由，直到現在她從未到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經過十多年後，中國的國防部長遲浩田到美加訪問，在加拿大的國會中，竟說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人死亡，這真是天大的謊言，當年的狀況全世界都看到了。

在中國的觀念中，從以前就覺得自己是最好的，其他國家的人來到中國晉見皇帝（朝貢體系），都必須跪拜叩頭。美國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帶領著黑船到日本，當時中國已經發生鴉片戰爭，有些日本人已經知道這件事情。雖然日本採取鎖國政策，只允許荷蘭人在長崎活動，荷蘭人不宣教，卻將西方的知識傳入日本，稱為蘭學。槍枝則是由葡萄牙人引進日本，就此而言日本對外還有一個窗口。當培理來到日本，培理知道日本有人可以說荷蘭語，就利用荷蘭語的通譯與日本幕府溝通。雙方接觸後，日本人才發現自己的落後，認為是語言出了問題，日本文字必須用羅馬文字拼音，當下中國也有一小部分的人認知到這個問題。我本人對中國文化有點感冒，談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嘴巴講

得非常漂亮，實際作為卻不是這樣。文化不只是過去偉大文學思想繪畫建築等等靜態，而是動態的，也應該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態度和思考模式等等。

此外，中國人常說日本人同文同種，但日本話與中國話完全不同，日本語是借中國的漢字，這不是同文同種的意思。日語有訓、讀兩種發音，困難的字都可以用這兩種讀音表現出來。也有語言專家特別研究日本語言，他們認為這是日本語的雙面性，一個字卻有兩個意思，或是一個字有兩種發音方法，如頭有とう和あたま的發音。其實我對漢字非常感佩，也覺得非常偉大，漢字可以言簡意賅的表現內容，像是中國或日本的電視臺訪問外國人，電視上的文字已表現受訪者的意思，反而畫面還呈現受訪者還在講話的影像。但對現行簡體字，我有不同的看法，若是一個人從未學過中文，學習簡體字不見得比較快，反而需要花更多時間學習，根據研究報導，須多花超過 27% 的時間學習簡體字；我是一個學過中文的人，現在在閱讀簡體字上也覺得有些難度，而電腦也改變了很多中文書寫的問題。

中國政府的想法，從駱家輝 (Gary F. Locke) 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可見一斑。駱家輝原本是美國華盛頓州前州長，後來擔任聯邦政府商務部長和美國駐華大使。他是華裔美國人，卻代表著美國，中國也不喜歡他的行事作風，所以當他準備辭職離開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批評他是爛掉的香蕉。³⁶ 中國的官方媒體怎麼能以爛香蕉稱呼一國的大使，這是很過分的事情。

36 〈別了 駱氏家輝〉，《中國新聞網》，2014 年 2 月 24 日，網路版。參見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2-27/5892576.shtml> (2015 年 9 月 15 日檢索)。

劉柏川 (Eric Liu) 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是前美國總統柯林頓演講撰稿人，針對這件事，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美國政府能讓一個完全是中國血統的中國人，同等於美國人，為美國做事。反之，如果我是個外國人，我認真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我能做一個中國人嗎？答案卻是否定的。這就是認同問題。有位 UBC 歷史系教授他每年都來臺加文化協會舉辦的臺灣文化節，一個人靜靜地觀察，他的研究以華裔移民為主 (Chinese Canadian Historical Society)，他談到許多華裔移民在外國出生，看起來是中國人，但卻無絲毫中國的認同，對中國也不了解。但對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而言，他應該永遠是中國人 (Chinese always Chinese)。

臺灣受中國影響很大是事實，統一並不是唯一的道路，從其他國家也有例子可尋，例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深受英國影響，以前都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後來都自行獨立，獨立後各國與英國仍維持著友好的關係。而臺灣和中國現在的狀況，只要臺灣獨立，中國就準備用武力控制臺灣，這是多麼恐怖的事情。現在有些人認為臺灣的現況已經是獨立的狀態，但世界上其他國家卻不承認，只是自己高興而已，自我感覺良好。

九、加拿大的民主與尊重

加拿大國會有位自由黨議員 Steven Owen (當時自由黨為執政黨) 與我有些交情，我希望他能支持臺灣進入國際社會。有次加拿大國會在討論是否支持臺灣進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會後他與我私下談話，他說加拿大官方不支持臺灣進入 WHO，但加拿大反對黨卻支持臺灣進入 WHO，依據正常法定程序辦了投票。因為 Steven Owen 是執政黨內閣成員，他不能反對黨的決定，所以他在投票時投了反對票。他對我感到很抱歉，但他必須與黨的立場一致。他很在意這件事情，曾打電話告訴我這件事，當時因為我不在家，所以他在電話答錄機留下很長的錄音。週末他回來溫哥華後，他又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必須跟我談這件事。我表達我知道他的感受和立場，他很感動我能夠理解他的做法，若他與內閣站在不同的立場，他必須辭職。不過他覺得他的想法和黨的做法不同，後來他還是辭掉國會議員，我不了解實際原因，或許可能是因為別的事情讓他做了辭職的決定，因他議員的任期還有兩年的時間，所以國會議員重新補選，而他改到 UBC 擔任副校長。

有一件關於加拿大民主的展現是來自我的兒子 Mark 處理的案件，Mark 本身是移民第一代或一又二分之一代，他在六歲時到加拿大。Mark 是名律師，他曾經為朋友承接一個案件，並提告至加拿大的最高法院，那個案件有關加拿大公民權，凡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嬰兒，全部擁有加拿大的公民權，問題在於境外出生的嬰兒，若父親是加拿大人，母親非加拿大人，還是仍是加拿大籍人；若是相反，父親非加拿大人，母親是加拿大人，嬰兒就不是加拿大公民。這是一種性別的歧視，這個問題在加拿大法律已被修正，但在法律修正前出生的孩子必須自動申請。這個案例就是父親為外國人，母親為加拿大公民，當原告主動向加拿大政府申請公民資格卻被拒絕，因為他有殺人犯罪的紀錄，因此原告提告加拿大聯邦政府違反法律規定。這個原告不是好人，也沒

有錢，甚至受政府小額的金錢補助，等於是原告拿政府補助的錢來提告聯邦政府。Mark 有幸有機會能幫助原告，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年可以接受的案子有限，而這個案子因為意義重大，才得以以上訴到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不能因為原告曾犯罪就拒絕發給公民資格，因而勝訴。我認為加拿大政府卻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是很民主的作法。

而加拿大社會對人的尊重，我認為從修正節日的名稱也可以看出。針對「Chinese New Year」這個節日的說法，我曾寫信給 The Vancouver Sun 報社。中國稱為春節，臺灣則稱舊曆或是農曆新年。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有其他族群如越南、韓國等也慶祝舊曆新年，所以我認為改成「Lunar New Year」是更合理的名稱。讀者投書必須有聯絡的電話號碼和住址，以表示負責。報社同意我的看法後，往後報紙刊登類似消息就更改為「Lunar New Year」。之後我送同樣的電郵至公營的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Television）溫哥華分部，兩三個禮拜之後我接到多倫多總部某副總打來的電話。他先感謝我的來信，讓他們知道我的問題，他們另外調查研究後，得到同樣的結論，他發了一個內部的備忘錄給各部門，從現在開始一律稱為「Lunar New Year」。我很佩服他們的專業精神和禮儀，我也感到被尊重，我只給了我的名字、電話和地址，是一介市民，並沒有提及我的身分或代表任何團體。

十、我的妻子：王愛真

我的太太愛真，她也有滿洲經驗，她的父親王大樹在滿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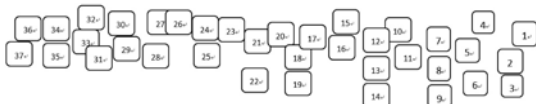
醫，在錦州開設錦生醫院，錦生醫院規模很大，還另外聘請四、五個臺籍醫生看診，醫院的護士有日本人也有滿洲人。日本人和滿洲人都會到錦生醫院看病，所以醫院也請了兩種類型的廚師，一種是負責日本料理，另一種烹煮滿洲料理。錦生醫院的事情大都是愛真告訴我，詳細情形我並不清楚。

愛真在滿洲出生，在錦州地區成長。她三歲時罹患嚴重的肺炎，當時病情嚴重到他爸爸和其他四個醫生都要放棄治療，甚至連棺材都準備了，卻幸運地恢復健康，所以她一輩子感謝上帝，從那一天開始每一天是額外的恩賜，是上帝的禮物。長大後愛真在錦州女學校（女子中學）就讀，當時全校師生只有一位臺灣人（愛真），一位滿洲人高官的女兒。其餘全是日本人，愛真一家人一直沒有改日本姓名。然而，雖然雙方父親認識，我們卻從未見面，直到後來我們同在臺灣大學求學才認識。愛真的妹妹愛惠曾說在滿洲時自幼學習鋼琴和舞蹈，曾經到奉天、山海關、大連等地方，岳父曾帶愛真與愛惠到奉天看博覽會，因年紀小，已經忘記博覽會的內容，唯獨在火車上與明星李香蘭相遇，並同車廂吃飯，此事令人興奮無法忘記。此外，他們也造訪大連老虎灘、外祖父陳章哲³⁷經營的蘋果園，蘋果園約17甲，愛惠記憶中的蘋果又大又好吃，每當採收期，外祖父還須請數十位工人幫忙採收。二次大戰結束後因政局動盪不安，岳父擔心孩子的安全，故

37 陳章哲(1884-1976)，彰化北斗人，外科醫師。1909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10年底回北斗開業。1914年赴日本留學，1916年到大連，1918年在大連小崗子仁濟醫院開業，日本戰敗後於1946年返臺。1972年3月4日在臺大景福會第23屆聯合同學會曾針對《養生之道》(八十多年來經驗談)進行演講。



錦州王大樹醫生等人在錦生醫院合影



錦生醫院為滿洲國政府、滿鐵共濟指定醫院。依據編號：1. 中國人廚師、2. 醫師夫人(或藥劑師夫人)、3. 孩子、4. 中國人長工、5. 臺灣人陳對、6. 醫生孩子、7. 中國人長工、8. 醫生夫人、9. 孩子、10. 中國人(管家)、11. 院長次女愛惠、12. 中國護士、13. 醫生夫人、14. 孩子、15. 中國人(管家)、16. 院長長女愛真、17. 中國護士、18. 院長夫人、19. 院長長男仁傑(1942年出生)、20. 中國護士、21. 臺灣護士、22. 院長三女錦霞、23. 臺灣護士、24. 臺灣護士、25. 王大樹院長、26. 臺灣護士、27. 臺灣護士、28. 臺灣蔡醫生、29. 日本工作員、30. 日本護士、31. 臺灣醫生、32. 日本護士、33. 日本工作員、34. 日本工作員、35. 臺灣陳藥劑師、36. 日本工作員、37. 臺灣藥劑師。(王愛惠女士提供)

帶愛真與愛惠搭客輪回臺灣，交與祖父王長勝幫忙照料，隨後又返回錦州與岳母相聚，直至 1948 年左右兩人才回臺灣。

愛惠回憶在小學的教育中，因時事環境影響，換了日本、中國、臺灣三種不同的教育，語言、文化、習俗的不同，導致生活適應上很困難。她們回臺後，愛真在長榮女中就讀，她是一位常

常會感謝的人，因為從小生過重病，往後活著的每一天，都認為是上天的恩賜，在初三時想將來長大做個傳教士來報答上帝。高中畢業後愛真考取臺大動物系，她比我晚一屆入學，因為化學差，她父母請我當家教替她加強化學，後來化學成績及格，但因為對動物系沒有興趣，就轉到外文系就讀。因為這層關係，我們彼此認識也互有好感，就開始約會，因老家都在臺南，兩人相處無太多拘束，我很欣賞愛真溫柔的個性。愛真畢業後陸續在臺北市女中、臺北市立初級農業職業學校（松山工農前身）教書。1957年兩人在大灣結婚。我出國進修，大兒子已經出生，二女兒則在愛真腹中，她沒有隨我一起到美國芝加哥，我在芝加哥工作，每月可獲得美金五十元的薪水，直到三年後才在美國團聚。當時我改在底特律擔任住院醫師工作，一個月有美金三百元，但須自行負擔飲食起居。

愛真在生活上總會提點我，對我的人生影響最大，我能變成更好的人是因為我娶了愛真（Today I am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I was married to her.），我常有一個感覺，使我覺得愛真和上帝之間，有個直通電話。在加拿大生活時會有個朋友找我在他死後替他念悼詞，這個朋友在六十多歲罹患白血病，並做過骨髓移植，後來白血病再度復發。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有人請我做這件事，我感到非常榮幸。不過當時我非常忙碌，有天愛真忽然提醒我必須去探望這個朋友，別人也告訴我這個人一直在等我去找他。隔天我馬上去探望他，與他閒聊中不停說笑，他告訴我他已經不害怕死亡，沒想到第二天或第三天他就過世了。若愛真沒有提醒我去看他，我一定不會去看他，我就永遠沒辦法彌補這個遺憾。

愛真因胰臟癌已過世五年，她自從診斷到死亡，僅三個多月，全程沒有住院，因沒有食慾一直變瘦，但她在家休養，內心感到舒服和平靜。愛真的家人之中，我對他的外公陳章哲印象深刻，他的身材高大，對於養生之道非常有心得，也愛講孝道的故事。但他也有古怪之處。他非常注重衛生，到餐館吃飯都自帶酒精消毒餐具，平日看的報紙也要消毒。



陳章哲先生全家福

為陳章哲夫婦結婚紀念所攝，拍照成員多為王大樹、陳瓊珠夫婦及其子女。前排右起王大樹夫婦、陳章哲夫婦、二妹王愛惠夫婦，後排右二為三妹、右三為弟弟、右四為六妹、右七為五妹

十一、身體病痛

我在民國 91 年（2002）被診斷罹患膀胱癌，同月又被診斷前列腺癌，這是兩種不同的癌症，而非轉移，膀胱癌的腫瘤可利用膀胱鏡取出，前列腺癌則用放療治療，兩種癌症都痊癒，經長期追蹤沒有復發的傾向，但最近攝護腺特定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簡稱 PSA）指數有升高的傾向，可能有 biochemical recurrence（生化復發）。民國 95 年（2006）中風，導致食物吞嚥困難，左腳與說話受到影響，當時住院兩個月，喝水最困難，必需在水加黏稠劑才可服用，兩三個月後我開始復健，終於慢慢恢復行走能力，四個月後才可以正常喝水，但右腳卻越來越無力，將近二年後才查出是原發性側索硬化症（Primary Lateral Sclerosis），³⁸ 是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簡稱 ALS，又稱漸凍人症）的一種，因紐約洋基隊著名的選手 Lou Gehrig 也罹患這種病，又名為葛雷克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³⁹ 最近因潑冷水的募款活動（Ice Bucket

38 這種類型較為特殊且非常少見，只侵犯上運動神經元細胞，男性罹病機率是女性的 2 倍，一般在 50 歲後才發病。症狀通常先在腿部出現，其次是軀幹和手臂，最後才會侵犯到吞嚥和呼吸肌肉，其主要症狀包括雙腿無力、僵硬、抽搐、平衡障礙及構音困難等。這型疾病通常不會致命，但會嚴重影響生活品質。參見臺北聯合醫院忠孝院區網站，<http://www.tpech.gov.taipei/ct.asp?xItem=64515283&ctNode=65390&mp=109171>（2015 年 12 月 1 日檢索）。

39 Lou Gehrig 是美國 20、30 年代的著名棒球明星，效力紐約洋基隊，曾 4 次奪得美國職棒大聯盟最有價值球員獎（MVP），在 1939 年，當時 36 歲的他被診斷患病，於 1941 年去世，Lou Gehrig 氏病因而得名。http://www.24drs.com/Special_Report/ALS/prelude_1.asp（2015 年 6 月 25 日檢索）。

Challenge)，這種病更讓廣為人知。

這種病會逐漸侵襲上、下運動神經元，罹病的人漸漸不能行動，漸漸不能吞嚥、講話，直至無法呼吸，需一步步在身體裝設鼻胃管、氣切。可怕的是身體如此，腦筋卻很清楚，也能接受外界的感知，其中的殘酷莫過於此。這種疾病與中風症狀類似，因此醫生在我中風兩年才確診這個病，由於我的病況較輕微，我也問過主治醫師，我們都認為會死於其他疾病，而《12個禮拜二的課》就是討論漸凍人的書籍，我很喜歡這本書，這種病告訴你會死亡，也給了一段時間，到了最後的時間才會想起人生的意義。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但我認為這本書所表達的是「未知死焉知生」，與孔子所說的相反，當一個人真正了解只剩下短暫的生命時，才會認真地思考生命的意義。在我身上顯現了四、五種疾病，可謂是病理博物館，現在我仍好好活著。現在的社會老人數量太多，也是很大的社會問題。

十二、基督教信仰

我不是馬上接受基督教信仰，而是慢慢接受，我看到一些基督教傳教的事蹟和經歷，如馬偕等傳教士一生都為臺灣服務，讓我感動；基督教的信念就如同左手在做的事情，不需要讓右手知道。基督教長老教會非常重視講道，在教條中，第一條人生的目的為何？就是榮耀上帝，enjoy Him forever。人生不一定要痛苦，痛苦雖然避免不了，但也不是一直都處於痛苦之中。

我一直在溫哥華的 Richmond Presbyterian Church 做禮拜，

今年這個教會剛好成立五十周年，我一直很感謝上帝賜福於我和我的家族，我有今天完全是上帝的愛和恩賜。目前雖然有一些病狀，我要好好地珍惜上帝所賞賜的每一天。我經歷日本時代的滿洲國（東北），臺灣，美國，最後定居在加拿大。加拿大是我的家，臺灣是我的根，這兩樣就是我的認同，並不互相排斥，反而是互相補足（Not mutually exclusive, but on the contrary mutually complementary.）。

